

原则遵循·制度优势·形态表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三重面向

曹家宁

(长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既有历史出场之必然,也在长期生态实践中形成了对西方现代化人与自然模式的全面超越。为了进一步明晰其独特意蕴、理解其本质特征、厘清其丰富内涵,有必要回顾和总结现有研究的思想脉络和重要共识,并在此基础上诠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多重向度。研究认为,从生态实践的原则遵循来看,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在生态实践过程中,逐步探索并确立了以尊重生态弹性、遵守生态良序、追求生态效率、保障生态共享为框架的四大原则;从生态实践的比较优势来看,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具有发挥人民至上的价值锚定优势、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政党领导优势、发挥善于生态协调的政治自觉优势三方面优势,形成了对西方现代化生态实践的立体超越;从生态实践的形态表征来看,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具有以技术的生态变革推动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以资本的生态善用推动生态生产力发展,以范式的生态转换推动人类文明繁荣赓续的创新表征。研究表明,在坚守原则、发挥优势、创新形态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必将向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实现生态发展跃迁、彰显大国生态担当、延展生态文明智慧的方向持续发力。

关键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实践;生态文明;生态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X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4)02-0001-18

收稿日期:2024-0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3VSZ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1JHQ025)

作者简介:曹家宁(1990-),女,陕西西安人,博士研究生。

Principle adherenc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and morphological representation: three aspects of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AO Jianing

(School of Marxism,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process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not only a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but also re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departure from the Western modern model of man-nature interaction, as evidenced by long-term ecological practices. To further elucidate its distinctive significance, comprehend its essential traits, and delineate its rich implications, it is imperative to scrutinize and synthesize the ideological context and significant consensus of existing research. Building upon this foundation, th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modernization concerning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can be interpreted. This study contends that, grounded in the principles of ecological practice,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fosters harmonious symbiosis by progressively articulating and establishing four key principles: respecting ecological adaptability, upholding ecological orderliness, pursuing ecological efficiency, and ensuring ecological sharing. Leveraging comparative ecological advantages,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oasts three key strengths: harnessing the anchoring value of human supremacy, leverag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historically-initiated political party, and capitalizing on politically spontaneous adeptness in ecological coordination. This creates a three-dimensional transcendence of Western modern ecological practices. Furtherm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practice's morphological representation,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xhibits innovative characteristics by facilitating free and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through technological ecological advancements, enhancing ecological productivity via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fostering continuous civilization prosperity through paradigmatic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Through adherence to principles, leveraging advantages, and innovating forms,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ill persist in advancing towards the attainment of improved livelihoods, ecological development

breakthroughs, showcasing national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ies, and extending the wisdo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cological practi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不同的国家资源禀赋与社会历史文化差异造就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1],深刻改变了作为人类物质生产基础的自然界,引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变革。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工业化发展模式造成人与自然的矛盾加剧,新时代必须全面准确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有效解决这一问题^[2]。故而,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3]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列入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之一^[4]。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向度^[5],也表征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态友好性。

当前学界主要从以下5个方面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展开研究。第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研究。生态哲学核心关照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关系,主张全面反思工业现代化“黑色发展”之缺陷,推动现代化的生态转型^[6]。其中,西方生态哲学在“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主客二分取向中反复徘徊^[7],而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不仅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质料^[8],也在实现“第二个结合”的现实场域中,为现代生态价值观形塑提供有益借鉴^[9]。

第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总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视为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本性的体现^[10]。马克思将自然视为“人的无机的身体”^[11],直指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体性。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体戚与共、命运共同作出精妙诠释,是对近代机械自然观的超越^[12]。同时,就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来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尺度“再生产整个自然界”^[11],也唯有如此,人与自然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解^[13]。恩格斯亦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诉求必将在人的解放、劳动解放和社会解放中实现^[14]。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步将“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区分,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华,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生态超越^[15]。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继承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反对在人与自然关系中进行所谓“价值排序”^[16],突破了西方生态哲学思想中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两种传统生态价值观的根本对立,实现了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有机统一^[17]。

第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经历了从“天人合一”“征服改造”

提升到“和谐共生”的高级自觉阶段^[18],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走向和谐的转换过程^[19]。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0],和谐共生所追求的是人和自然本质力量的显现,所指向的是人与自然从资本的奴役中的自我解放^[21]。因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释放更高质量生态生产力^[22],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显现。从实践层级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是一个拥有多层尺度的范畴,其不仅体现在全球生态治理格局、美丽中国建设这样的宏大叙事之中^[23],也贯穿于乡村生态振兴^[24]等基层实践之中,体现了人与自然深度耦合的紧密关系。

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贡献与意义。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国家经济生态化转型的重要价值引领^[25]。目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已取得重大历史成就,如生态文明战略地位实现历史性提升、法治体系日趋完善、生态系统安全性大幅提升、绿色低碳转型向好发展等^[26],标志着文明主体对人与自然关系现代化的重大历史重构^[27]。

第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发展进路。随着基础研究的逐步完善,已有学者从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柔性链接^[28]、自然资源资产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29]、数字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30]、生态美学的现代化转型^[31]、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32]等方向继续开展研究,以期实现现代化全过程、全领域、全动力的生态化^[33]。

总体来说,当前学界对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现代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基础、内涵逻辑、实践成就和发展优势等方面,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实践过程中所内聚的原则遵循、所内嵌的制度优势、所蕴含的创新形态等关注相对薄弱。本文将研究视野聚焦于此,以期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提供一定理论参考。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原则遵循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不仅是实践过程的结果,而且是持续动态的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生成的实践原则,同时也进一步用以指导未来的生态实践。总体而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态实践遵循着“弹性、良序、效率和共享”四大原则,是发展阈值、发展秩序、发展水平、发展本质的综合体现。

(一)以弹性原则框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阈值

弹性原则是一种理性原则,基于自然界对人的客观限制,人服从于自然规律而存在。其本质是人类活动,人的本质生命力量的发挥首先受制于自然界客观物质基础。所以,人类实践活动与自然之间必然存在一个阈值区间,也是生态环境的承载上限。生态学家将此定义为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稳定性,即生态系统在受到外界干扰时维持自身功能及所处状态不变的能力^[34]。这是自然规律,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前提。中国所实施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实质上就是遵循这一

原则预设经济社会发展阈值、预留未来弹性空间。

既然上限存在,这一原则又为何是“弹性原则”而非“刚性原则”呢?因为对这一上限的科学认知与动态把握决定了这一原则的实践特点。新马尔萨斯主义者认为,自然存在极限(生态上限)且是不可动摇的、发展的天花板,从而将生态危机理解为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危机^[35],将资本与自然的矛盾转嫁为人与自然的矛盾,这是一种消极实践观。而马克思主义者对上限的看法则是开放的、积极的。恩格斯从“自然的限制”角度诠释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认为自然对人的限制是弹性的,其主张:(1)地球不是封闭系统;(2)极限(自然的限制)在一段时间内相对存在;(3)自然、社会与科学技术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但不存在绝对限制^[36]。因此,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发展之上的积极实践观,而科技进步、社会协调与自然限制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弹性空间,恰恰是人类主体创造性得以发挥的场域。即弹性原则不仅是尊重自然规律的原则,也是尊重人的主体性的原则。从而,人的发展必要性不能被僵化原则扼制,而是要在激发人的潜能的基础上去克服自然的相对极限。从这个角度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中的弹性原则,不是对人的发展的约束,而是对人的主体性的积极彰显。

(二)以良序原则规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秩序

良序不仅适用于社会治理议题,也适用于生态治理议题。良序基于善治而生成,是

社会治理能力的结果显现。“构建和维系社会秩序,是社会治理追求的基本目标,所谓善治即良好的社会治理,就其结果而言,就是通过社会治理使社会有序运行。”^[37]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耦合度加深,对秩序的要求也就越高。本质上,良序不仅指有秩序,更是指“好的秩序”。

在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权益争取、环境综合治理还是其他环境议题,都会出现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兼顾问题。遵从良序原则的生态实践是一种从生态约束到社会约束的过渡性原则,需要建立在高度自觉的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才能实现,“在自由组织的各类新式共同体中培养出理性自治的能力和习惯,建设良序社会的主体力量才有望发展成熟。”^[38]因而,良序是基于统筹多种复杂系统利益的“善治”而生成的。如果不能保证整体利益、普惠利益、安全利益和长远利益,那么在局部利益、等级利益、风险利益和短期利益方面就没有过多容错空间,在短期增长后就会出现断裂,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撕裂。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解放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实践基于良序原则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闭环。这表明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整体发展优先于局部发展、普惠发展优先于层级发展、安全发展优先于风险发展、长远发展优先于短期发展的良序逻辑。良序原则也成为规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发展秩序的主要原则。

(三) 以效率原则匹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水平

效率原则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原则。不论是人类社会的生产还是自然的生产,效率作为投入产出比,都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重要依据。生态效率通常指“通过创造有价格竞争优势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人类的需要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将其环境影响和资源利用的强度适配于地球的承载力水平。”^[39]效率原则最终指向的是人类利用、影响和改造自然的水平,也标志着人类社会形态的高低层级。效率原则追求以最佳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来保障社会经济系统的有效运转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而,效率原则也是衡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原则。

在生态实践中遵从效率原则、解放人的生产积极性,发展生产力,有效缩短实现社会基本福祉的相对时间,是现代化进程的合理诉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效率原则,指向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态生产力和生产力的和谐状态。原始社会就是经济贫瘠而生态繁荣的状态,因此既不具备社会生产力,也不具备生态生产力;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有限,人与自然之间既没有深层次耦合,也没有大规模冲突,有的仅仅是低水平共生;同样,工业社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较高,但生态生产力水平走低,物种多样性降低、资源稀缺、气候危机等都是生态生产力水平降低的标志,这样的社会同样不具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特征。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水平都高度契合的社会

主义社会,现代化福祉的各个维度才得以全部显现,人类社会才具有生态文明意义。

(四) 以共享原则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本质

共享原则的前提是公有制,体现着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发展本质。尽管自然界存在基于生态位争夺的竞争关系,但没有一个生命或种群能够无偿占有和无条件支配自然界,因而不存在基于私有制的资源占有排他性。而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基于私有制的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关系,且这一对立关系随着人对自然改造能力的增加而延伸到自然界,也就必然导向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与“难共生”。马克思主义启示我们,只有消除私有制,生态危机才能彻底消除。“私有制是人类历史特定阶段才存在的现象,与此相应,个别利益之间的分裂和对立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当这种历史现象消亡之后,由此所引发的生态危机现象也就不会再发生。”^[40]生态共享原则是建立在“逐步消灭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原则,强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利他性与平等性,要求解构当前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生产范式,体现了社会系统对生态系统的拟态管理与复归共生。

共享原则所蕴含的“开放、平等、互利”价值导向明确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其中,开放既是资源开放(人与自然的“公有制”)、也是信息开放和机遇开放,以确保人与自然关系处于动态平衡之中;而平等则建立在对弱势群体(如贫困人口、濒危动植物等)差异化的权益保障上。如果权益没有差异化的保

障,那么资源一定会高度集中于占据优势地位的一方,共享也会沦为“虚假的共享”;互利性是促成共享稳定长久的基础,不具备互利性的共享关系,其不利的一方维护共享的积极性较低,为了维持共享就需要更多的外部管理成本和监督成本,而具备互利性,特别是建立在开放平等关系基础上的互利性的共享关系,则所需管理成本和监督成本更小,这也就是确立共享原则的合理性来源。因而,共享原则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本质。

概而言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四项原则中,弹性原则由人对生态系统规律与社会系统规律的科学认知来予以学理确认;良序原则由中国式现代化的总路线和总方针予以实践承载;效率原则由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予以能力保障;共享原则由社会主义对自然及其衍生资源的“公有制”予以制度保障。四者相结合,构成了“安全兜底、地位平等、保护弱势、义利协调”的基本导向,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符合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利益的现代化道路健康发展。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现代化的制度优势

为了能够突破现代化发展瓶颈,实现对生态生产力的现代化解放和对社会生产力的生态化转型,践行对人民的生态文明承诺,就势必在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实践

原则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

(一) 发挥人民至上的价值坐标锚定优势

人与自然关系越是复杂,就越需要一个价值锚点。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就是始终围绕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原点展开实践。实践证明,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坐标,能够充分发挥中国式现代化把握人与自然复杂关系的锚定优势。

第一,在发展中内嵌生态环境议题的政治优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态实践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以顺利推进,离不开对权力的正确运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方面破除了对于西式民主选票政治的制度崇拜,另一方面奠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良性发展的价值基础,再次确认了作为集合性存在的人民是社会活动和国家治理的主导者。”^[41]这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个显著优势,那就是权力来源的政治正当性。马克思主义权力来源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权力的来源。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和实现的,都是属于人民的。”^[42]考察中西方政党绿色革命进程可知,受20世纪90年代风起云涌的环境运动的影响,西方的绿色革命是外部性的,即通过社会组织集结形成绿党,自下而上逐步嵌入国家权力之中,与其他政治议题共同争夺选举视野、增设职能部门,难以实现降本增效。而中国的绿色革命方式是内部性的,也就是在各

类政治议题中加入绿色考量,合并生态问题统一治理等。遵循效率原则的中国生态实践更具有主动高效的比较优势。

第二,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生态工程的体制优势。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具有平衡性、多样性、坚韧性和开放性特征,是一种生态型国家体制^[43]。这一优势显著反映在生态实践领域。生态实践问题往往牵涉空间广泛、涉及产业繁多(例如流域生态治理、重点功能区生态治理等),关涉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如果采用零打碎敲、缓慢推进的治理手段,则很难取得重大突破。而新型举国体制能够积极调动人民力量,有效推动重大生态工程。以生态移民工程为例,西方环境移民和生态移民往往隐含环境难民之义,这本身就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否定。相较之下,中国的生态移民工程是在统筹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依托新型举国体制,在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等复杂利益中取得平衡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系统性生态增益工程。例如“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作为全球最大的生态工程,通过空间层面的跨省合作、时间层面的代际安排、制度层面的一体贯通,将森林覆盖率从1977年的5.05%提高到目前的13.84%,森林蓄积量由1977年的7.2亿 m^3 增加到目前的33.3亿 m^3 ^[44],是生态领域举国体制优势的生动写照,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巴彦淖尔考察时指出的那样,“像‘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这样的重大生态工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干

成。”^[45]同时,注重在生态工程中嵌入对弱势群体的生态增益。例如,在三峡库区生态移民工程中,发挥兼顾人与自然利益的实践优势,在科学论证后审慎决策有无移民搬迁之必要和系统方案;迁移后不能对迁入地造成新的生态环境问题;持续追踪迁入地的发展,建立具有可持续导向和长效制度保障等^[46],这些措施都建立在人民至上的价值锚点基础之上。

第三,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理念优势。“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核心理念,表征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序列,也是共享原则的集中体现:一方面,这是生命共同体的共享,自然灾害越快被解决,则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损失就越小;另一方面,这是国家发展成果的共享,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制度越是人性化,则对生态弱势群体的保护就越大。2019年8月开始的山火成为澳大利亚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场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超过1000万公顷,造成31人死亡,逾10亿只野生动物丧生,综合损失难以估量。澳大利亚拥有先进的突发事件应急指挥系统ICS^①,何以至此?研究揭示,作为联邦制国家,澳大利亚缺乏国家层面统一领导的森林消防工作机制,在火灾防控、队伍调动、响应机制、装备调配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47]。除此之外,澳大利亚官员也没有“以人民为中心”的公仆意识,火灾发生后澳大利亚总理仍按计划出国度假,由于没有追责制度,各级地方政府官员陷入“事小不必管,事大更不必管”的消极怠

① 是指 Incident Command System, ICS。

政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对森林山火危机的强大解决能力。2022年8月21日重庆市北碚区缙云山突发山火,依靠中央指挥调度、地方快速响应、专家科学指导、群众紧密配合,仅五天四夜便扑灭山火,避免了灾难性后果。由此看出,中国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体系之所以能发挥出强大功能,不仅仰赖先进的灾害管理技术系统,更仰赖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这种生命至上、统一指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危机应对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又一彰显。

(二) 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政党领导优势

相较于一般社会问题,生态问题更具紧迫性、复杂性、长期性和系统性,考验着执政党的治理决心与治理能力。应对生态挑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需要在意志顽强、能力强大、生命坚韧的执政党领导下才能实现。

第一,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形成积极应对挑战的精神优势。FUKUYAMA在西方民主国家的鼎盛时期曾草率地做出过“历史终结论”的判断,认为人类历史的最高制度形态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制^[48]。然而进入21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频频出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陷入“政治衰退”之中。反观中国式现代化,以其巨大成就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49]历史无数次证明,掌握历史主动精神是迎战危机、化解危机

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存亡之际,恰是为了挽救危机而出,并在长期实践中多次化解生存危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孕育了自身独特的历史主动精神。在新一轮生态危机面前,历史主动精神将再次发挥精神动能优势,避免陷入优势衰退,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注入力量。

第二,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形成善抓历史机遇的理性优势。中国共产党善于判断历史大势、认清历史方位。“百年来,党能够团结带领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党始终坚持和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在重大历史关头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主动作为,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50]在21世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与自然面临共同的风险挑战。善于在生态矛盾中发现机遇,识别系统的风险性和风险的系统性,才能确保防范及时、应对有力,才不会增加各种风险的叠加传导和演变升级。中国共产党对生态问题的反应速度、举措力度和决断尺度是西方国家无法比拟的,种种事实已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已在生态危机中牢牢抓住了生态现代化转型的新机遇。据国际能源署(IEA)《国际能源投资2023》报告显示,2019—2023年间,中国对清洁能源的支出增长位居世界第一^[51],成为世界清洁能源转型的领头羊,形成先发优势,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变生态挑战为生态机遇,这本身就是善抓机遇的理性优势。

第三,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形成先立后破的效率优势。先立后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未

雨绸缪、并联式推进现代化的治理逻辑。就内部条件而言,中国的生态基础相对薄弱而人口规模巨大;就外部条件而言,世界又处在前所未有的“社会-生态”系统深度耦合之中;就约束条件而言,中国还需要在工业现代化的同时紧锣密鼓地推进生态现代化。种种境况叠加,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没有闲庭信步的空间和节奏,必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做先立后破、只争朝夕的急行军。急行军最考验治理水平,而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我国现行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52]内生性演化需要内部驱动力,这种内驱力就是历史主动精神。通过不断内生性演化形成的高效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与中国国情实现了良好匹配,也让中国能够在淘汰工业现代化落后产能的同时,高质量推进生态现代化转型,做到短时高效、又快又好。

(三) 发挥善于生态协调的政治自觉优势

生态协调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执政党具备与生态文明相匹配的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搭建的政治生态能够高度适应生态协调的挑战。

第一,执政党勇于自我革命是生态协调的根本支撑。生态协调涉及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调控,任何环节都有可能出现意外或纰漏,因而容错能力与纠错能力十分重要。这要求执政党必须具备随时推翻既往经验、不断调整实践方向的政治勇气。“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能够深刻

反省、及时发现并全面纠正自己的错误,从而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53]这是中国的生态协调之所以能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进行广泛动员的根本支撑。现代政党理论中,政党被视为受内部与外部双重演化作用的有机组织,其组织优势在于它较之个体生命具有更长的生命周期和更高的集成智慧。执政党必须在政党“生态位”竞争中赢得人民支持,才能获得政党生命周期延续和集成智慧优化。基于此,勇于自我革命的政党品格就尤为重要。一方面,通过自我革命实现政党“新陈代谢”,才能保持政党统筹党内党际关系的生命力与向心力,生态协调这类涉及复杂利益的政治实践也才能实现。另一方面,自我革命是在不改变初心立场的前提下修正自身方向,而非没有底线地灵活修正立场,避免出现类似欧洲红绿联盟中政治联盟扩大而影响力并未提升的悖论^[54],这一悖论并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出现,更加说明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而又坚持初心立场的品格是极为稀缺的政党基因,也是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行健致远的政党优势。

第二,新型政党制度是生态协调良序运行的制度保障。中国政党制度并非竞争型政党制度或垄断型政党制度,而是集中领导与广泛参与相结合的新型政党制度^[55]。其优势在于既有领导核心,能够通过强大的政治向心力形成稳健的实践方向,又能够通过多方参政议政形成高效的分工协作。这种分工协作不同于机械零件式的分工协作,其发挥的是有机体作为系统的整体优势。“一切规

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56]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能够发挥总体价值而非独立器官价值的政党制度,具有如同成熟有机体一般的组织结构。因此,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可以被视为一套高效有序的有机政治生态系统,能够胜任高度复杂的国家治理工作,实现更加强大的组织嵌合、领导作用和善治效能。这与生态协调所要求的复杂、高效、动态、有机管理体系具有天然适配性。正因如此,新型政党制度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实践必然是全时空、全方位和中国化的。

第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生态协调公平运作的民主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以广泛协商回应人民诉求的良政善治,也是国家政治避免“民主内耗”的最优解。自“生态文明建设”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那一刻起,中国长期发展战略中就有了浓郁的生态底色,且这一生态底色是稳定的,不会因国内国际其他形势变化而被推翻。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全国、省、市、县四级环境问题的系统统筹,在每一层级安排与生态协调相适应的民主协商制度来实现对生态文明体系的制度建构,更加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善抓主要矛盾、善于协同治理的强大效能。例如,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商共治在主体多元性、客体确定性和权力多向性三方面充分体现了中国民主制度的内生优

势^[57]。与西方政党飘忽不定的矛盾变化相比,中国制度优势在于定力强而执行稳,这与自然界要求稳健发展是相匹配的。当前美国环境保护陷入了资源保护主义和自然保护主义的路线之争,反映了美国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先后性上的摇摆不定^[58]。而这种路线之争却没有出现在中国生态实践之中,中国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生态决策的设计来统合各方生态利益,降低了协商成本,延展了协商共识,体现了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善于协调复杂冲突的强大优势。这也给全球生态实践带来新曙光:通过制度赋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协调是可以实现的。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形态表征

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不仅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自然的道义,更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进形态,是对工具理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对立的畸形文明状态的全面超越。其形态表征主要体现在对技术的生态变革,对资源、资产和资本的生态善用和对文明发展范式的生态转换上。

(一)以技术的生态变革推动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对于科学技术引起生产变革、生产变革推动社会变革持积极态度,认为人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改造自然的的活动,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而言,以技术创新实现生态

变革恰是对这一主张的生动实践。

第一,就技术的生态变革的发生场景来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本就是并行不悖的价值目标。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就经历了多轮基于技术革新的价值观迭代,这种价值观迭代也使得人对发展的关切重心发生位移。实际上,技术变革推动发展关切位移是符合人的本质发展规律的,即遵循“个人—他人(亲缘的)—社会(类)—生态(非人)—共同体(系统)”不断延展的本质规律。这说明人的本质生命力随着发展在不断释放,才能使得人有充分的动机与能力去扩展普惠群体。当人们普遍获得体面生活的时候,就会对自身发展产生新的渴望,城市的各项公共事业就应运而生;城市需要新的公共事业来实现普惠,于是对个体的关心转化为对群体的关心;当公共利益有了基本保障时,群体的进一步发展带来物品、信息的流通,人的视野被进一步放大,关切的能力与范围也被进一步放大,互联网技术及其所塑造的无限辽阔的互联网空间,让人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能力关注“遥远的他者”。依此原理,只有当新一轮技术革命到来时,人类新的正义关切——为非人的生命存在、为所依赖的生态系统,以人与自然的彻底解放为目标的现代化才具备实践基础。也就是说,技术的生态变革首先是符合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的,这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单向度的人”有着本质区别。这生动地说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符合人的本质需要和时代趋势。

第二,就技术的生态变革的应用场景来

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利于对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新一轮技术革命将会让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而新旧技术革命的交汇期往往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由于传统非清洁技术占据市场优势、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优势和先发优势,为了让自己保持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传统势力会对绿色技术市场化竞争产生排斥,降低绿色技术的市场份额、阻碍其配套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推迟自身被绿色技术淘汰的时间节点。“在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中,传统非清洁技术领域的产品生产和技术研发存在利润优势,绿色技术创新后发劣势明显,仅凭市场本身难以实现技术进步朝绿色方向转变。”^[59]而中国“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制度优势能够确保生态变革中技术的顺利更迭,并能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将技术更迭的阵痛期缩短,以提升技术更迭的效率和广谱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效率原则也得到了充分落实。

第三,就技术的生态变革的过渡场景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利于对技术更迭的人性关怀。社会主义发展本质是人的发展,对技术的生态变革目的也是为了人。因而,对技术的生态变革不能仅仅是绿色产业淘汰污染产业这么简单,而是应当利用技术创新来帮助重构“社会—生态”系统的生产分配体系,让生态弱势群体能够从“人类对自然界再生产的再分配”中获利。当落后产业逐步淘汰时,资本可以快速转移,市场可以快速调整,但落后产业的技术工人却无法快速过渡到新兴产业当中,很可能“塌陷”为弱势群体,如美国“铁锈地带”的传统产业工人

即面临这一困境,可见资本主义现代化不能够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则以生态正义为导向,通过生态补偿与环境规制相结合的方式去规范技术更迭过程中的环境行为,缩短迭代的震荡期,从而实现技术迭代的平稳过渡。只有充分认识技术生态变革的全局性,将对人民根本利益的考量贯穿于“生态—生产—生活”全过程之中,绿色技术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价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共享原则才能真正得以贯彻。

(二)以资本的生态善用推动对生态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认可资本在发展生产力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60]但他同时也指出资本最终会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60]即就是说,当主要生产要素通过资本被组合在一起,即资本参与劳动的过程,是生产的,资本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般工具是可用的。但资本作为管理者参与劳动过程时,其根本目的是剥削,“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56]从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决不允许资本成为管理者,只将其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般工具使用。即发挥资本在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并切割资本作为管理者的剥削属性。

在生态层面,资本同样存在这样的“二象性”:一方面资本能够有效驱动自然资源资产化,将自然生产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资本的无限增殖逻辑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源的合理分配。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生产力本质,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反生态性”的扬弃。因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要对资本进行生态善用,就要以消灭资本统治权为前提,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对自然界造成损害,使其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不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经济决定金融,金融服务于经济,金融不能脱离经济盲目无序发展。”^[61]只有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统治权,才不会放任资本无序扩张。这也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善用的内在要求。

同时,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作为创造物质财富的一般工具使用时,其逐利的方向是可以引导的、速度是可以调控的、尺度是可以制约的、价值是可以再分配的,这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就中国绿色金融实践来看,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自上而下初步确立了“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思路,2017年浙江、广东、江西、贵州、新疆等五省八地(现已增至七省十地)被设立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自下而上开启地方实践。2021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进一步加大绿色金融支持力度。种种措施表明,中国始终引导资本向“生态善”的方向流通,不断盘活和

优化“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生态资本”的转化路径,充分彰显了对资本善用的强大制度优势。

(三)以范式的生态转换推动人类文明的繁荣赓续

人类文明发展范式的转换意味着为人类提供新的价值要素,以解决发展壁垒问题。农业文明为人类带来了稳定的安全价值,但科技壁垒导致其不足以支撑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工业文明为人类带来了繁荣的经济价值,但生态壁垒导致其不能够维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因而,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进程中,必然包涵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范式转换来实现人类文明繁荣赓续的创新表征。

第一,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更新。就世界历史来说,“人类文明发展总的来看就是人类追求自由全面发展理想的历程,并具体展现为对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理想追求。”^[6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63] 这其中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有着深厚积淀,而生态文明属于后发文明,需要建立在前4种文明发展基础之上。生态文明需要人实现对自然的人道主义,赋予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发展之善”。但这不是为自然界打下人类中心主义的烙印,而是客观上社会系统已经与生态系统紧密耦合的客观现实,要求人类不论是

出于对自然的还是对自身的利益关切,都必须将自然界纳入现代化过程之中。因此,生态文明是建立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基础之上的对人类文明的生态现代化更新。

第二,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激活。就国别特征而言,尽管生态文明是后发的,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天人之道”在中华文明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这种“和谐共生观”直到中国近代以来受西方思潮、自身现代化进程、科技革命等多重冲击下,才被“天人分离”和“天人对立”的“冲突对立观”所取代。这一分离又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走向弥合。恰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64] 这说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是对中华文明的生态赓续,而不是西方现代化生态断裂的修复与嫁接。其不同于西方文明形态“经济力量与霸权力量”的结合,而是“真理力量与道义力量”的结合。反映在人与自然的维度,不仅是对中华文明自然理性的当代激活,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人对自然的人道主义的集中体现。它要求人们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逻辑,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生思维,这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当代激活和生态赓续。

第三,实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嵌合。

资本主义现代化存在大量的生态裁剪和生态拼合,但这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嵌合。所谓生态裁剪,是指将贫困地区视为环境治理的真空地带,仅使其生活在最低环境标准之中的发展方案。这些贫困地区对地球生态圈的整体影响很小,也不影响富裕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贫困者就这样从现代化视野中被“裁剪”了;所谓生态拼合,是指在经济良好的地区投入大量绿色基础设施,从而实现局部的和谐共生,但人造和谐场景是机械式拼合而非生态嵌合,无法实现有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不仅要包含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修复生态等常规实践,更要将工业现代化以来人类从自然中高度剥离的生产方式再度嵌入自然之中,并彻底转变后代人与自然互动的生存、生活、生产方式,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未来图景。

四、结语

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和归纳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进行了多维挖掘,探讨了在人与自然关系进入重大历史变革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实践如何以“原则遵循-制度优势-形态表征”三重面向,彰显其既不是人对自然宰制之路,也不是自然对人限制之路,而是人与自然逐渐走向和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本质。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受篇幅所限,在原则遵循部分,减少了对于原则遵循历

史生成过程的分析。同时,关于是否存在其他实践原则,仍有发掘与完善空间。二是在制度优势部分,主要论证了价值坐标、历史主动和政治自觉等方面的制度优势,对于三者的关联性,如人民价值坐标如何激发历史主动精神、历史主动精神何以生成政治自觉等内容,尚未深入探讨。三是在形态表征部分,尽管已经给出了事例来佐证观点,但缺少实证分析,研究仍有深入空间。以上不足之处将成为后续研究中的焦点问题,推敲完善这些问题能够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提供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 [1] 黄群慧. 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战略内涵与政策体系——基于经济现代化的视角[J]. 经济研究, 2021(4): 4-23.
- [2] 韩晶, 毛渊龙, 高铭. 新时代 新矛盾 新理念 新路径——兼论如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7): 12-18.
- [3]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 人民日报, 2017-10-28(1).
- [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 人民日报, 2022-10-26(1).
- [5] 李雪娇, 何爱平.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向度研究[J]. 社会主义研究, 2022(5): 17-24.

- [6] 卢风. 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兼论生态哲学的核心思想[J]. 理论探讨, 2021(6):94-101.
- [7] 糜海波. 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代生态伦理的哲学反思——兼论“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J]. 社会科学家, 2023(8):31-35.
- [8] 曹孟勤,姜赟.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略的哲学思考[J]. 中州学刊, 2019(2):92-97.
- [9] 王继创. 生态人生观与现代人的价值证明——基于生态文明新形态的人生价值观分析[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23(6):99-104.
- [10] 周光迅,王敬雅. 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5(8):135-143.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韩志伟,陈治科. 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从外在共存到和谐共生[J]. 理论探讨, 2022(1):94-100.
- [13] 解保军,杜昀谦. 人与自然:从马克思的对象性关系论述看和谐共生关系[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109-113.
- [14] 李蕙岚,孙清照.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及其现实径路——基于恩格斯自然观的考察[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0(7):10-15.
- [15] 王雨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J]. 求是学刊, 2022(4):11-20.
- [16] 李颂. 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超越性逻辑[J]. 广西社会科学, 2023(9):34-41.
- [17] 王青. 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的哲学意蕴[J]. 山东社会科学, 2021(1):103-110.
- [18] 高冉,王国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自觉演进[J]. 理论探索, 2019(1):48-53.
- [19] 马元喜,方盛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一项基于多维度的历时性考察[J]. 学术探索, 2024(2):1-10.
- [20] 叶琪,李建平.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探究[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9(1):114-125.
- [21] 李刚. 传统“中心论”向当代“和谐共生论”的复归——“人”与“自然”得以显现的必然路径[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5(5):4-7.
- [22] 穆艳杰,董瞩宏. 生产力生态化跃迁发展的逻辑理路[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3):124-131.
- [23]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N]. 人民日报, 2023-07-19(1).
- [24] 蒋成飞,朱德全,王凯. 生态振兴: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生态和谐“5G”共生模式[J]. 民族教育研究, 2020(3):26-30.
- [25] 方世南. 绿色发展: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经济社会[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15-22.
- [26] 王茹.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历史成就、矛盾挑战与实现路径[J]. 管理世界, 2023(3):19-30.
- [27] 郇庆治,苗旭琳.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阐释的三重维度[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1-11.
- [28] 罗桥,顾海娥. 生态与社会二重性: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环境社会工作新方向[J]. 中州学刊, 2024(2):95-103.

- [29] 丘水林,庞洁,靳乐山. 自然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一个机制复合体的分析框架[J]. 中国土地科学,2021(1):10-17.
- [30] 施志源,景池. 数字生态文明制度化:时代意蕴、发展困局与破局策略[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14.
- [31] 樊美筠,刘锦诺. 向生态美学转型——一个有机美学的视角[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3(4):155-160.
- [32] 李星林,罗胤晨,文传浩. 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发展:推进理路及实现路径[J]. 改革与战略,2020(2):95-104.
- [33] 张云飞,曲一歌.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系统抉择[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23-32.
- [34]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1973,4:17-23.
- [35] 阚唯,梁颖. 基于人口决定论再析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J]. 人口与计划生育,2018(4):42-45.
- [36]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37] 高峰. 社会治理秩序研究:面向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实践的社会秩序理论构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38] 倪寿鹏. 正义的多面孔:马克思与罗尔斯[J]. 哲学研究,2017(8):3-10.
- [39]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Eco-efficiency and cleaner production:Charting the course to sustainability [EB/OL]. (2006-08-01) [2024-01-31]. <https://docs.wbcsd.org/2006/08/EfficiencyLearningModule.pdf>.
- [40] 庄友刚. 生态问题的历史性及其意识形态化批判[J]. 人文杂志,2013(12):9-14.
- [41] 吴海江.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42] 习近平. 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9):3-6.
- [43] 胡锐军. 国家治理的生态型新型举国体制转向与建构[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5-17.
- [44] 董丝雨. 构筑抵御风沙的绿色防线[N]. 人民日报,2023-06-22(5).
- [45] 习近平在内蒙古巴彦淖尔考察并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EB/OL]. (2023-06-06) [2024-01-31].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6/content_6884930.htm?name=aging.
- [46] 刘彦随,璩路路. 近30年三峡库区用地格局变化与人地系统演化[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2(8):1664-1676.
- [47] 张勇. 澳大利亚山林大火的经验教训及启示[J]. 中国应急救援,2020(2):8-12.
- [48] FUKUYAMA F. The end of history? [J]. The national interest,1989(16):3-18.
- [49]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2021-11-17(1).
- [50] 王峰,郭亚欣. 中国共产党弘扬历史主动精神研究[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2(2):100-108.
- [51]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investment 2023 [R/OL]. (2023-05-01) [2024-01-31].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8834d3af-af60-4df0-9643-72e>

- 2684f7221/WorldEnergyInvestment2023. pdf.
- [52] 杜飞进. 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 社会科学,2014(5):37-53.
- [53] 侯衍社. 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内涵[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4):21-31.
- [54] 李凯旋. “绿色化”:欧洲共产党适应性变革的生态维度[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2):91-97.
- [55] 王永香,刘婷婷. 新时代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J]. 社会主义研究,2020(4):15-22.
- [5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7] 王树义,赵小姣.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商共治模式初探[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8):31-39.
- [58] 付成双. 文明进步的尺度:美国社会森林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J]. 世界历史,2017(6):50-62.
- [59] 董直庆,王辉. 环境规制的“本地-邻地”绿色技术进步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2019(1):100-118.
- [6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1]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62] 王雨辰. 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的高质量发展[J].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26-36.
- [63]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1-07-02(2).
- [64] 习近平.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人民日报,2023-06-03(1).

(责任编辑:杨海挺)